

20. 13

钟山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钟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

90
一九九〇年四月三十日

钟山文史资料

第二辑

目 录

李先念主席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1989年8月17日)	(1)
在全国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1989年8月24日)	杨成武 (3)
在全国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1989年8月24日)	张友渔 (5)
英家起义	钟起昌整理 (11)
解放前我县教育战线上的革命活动	唐 兵整理 (20)
花山河畔降敌军	唐 兵整理 (33)
血泪洒金竹	卢永旗整理 (39)
钟山县古县城初探	曾颂年整理 (42)
钟山县简易师范学校简介	袁瑞林、廖邦昌 (47)
广西钟山县发现一座西晋纪年墓	莫测境整理 (52)
广西钟山县西门岭一座吴墓的清理	莫测境整理 (55)
钟山县参议会资料	史 兵整理 (60)
楹联拾萃	丘 兵整理 (63)
钟山县董家峒婚俗调查	潘绍作整理 (67)
报雨岩	蔡佳祯整理 (79)

李先念主席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各位同志：

这次全国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将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研究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并规划当前的工作。

刚刚经历过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斗争，留给我们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小平同志曾经讲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包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革命传统的教育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的教育等。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用历史事实进行教育，让人民群众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三十年来，文史部门征集和出版了数以亿字的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许多朋友和同志，许多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孜孜不倦地撰写出大量的史料，又通过你们的辛勤劳动编印成精神产品，广为发行和传播，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光荣的。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会议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

李 先 念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

在全国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1989年8月24日)

杨 成 武

同志们，

今天，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在气候宜人的北戴河海滨隆重开幕了。李先念主席为大会写来了贺信，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也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讲得非常好。在这里，我有幸与同志们见面，同张友渔同志一道应邀参加这次盛会，感到十分高兴。在此，我谨向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向大会表示衷心的祝贺！

自1959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以来，至今已30年了。3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各届政协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下，在我们广大文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在众多关心热爱文史工作朋友的大力支持下，文史工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祖国的统一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每当我看到一本本文史资料选辑，看到一部部专题史料，看到《纵横》杂志，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些，感受到其中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

这次会议，是在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形势下召开的，主要是研究解决文史资料工作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题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经过

十年的努力，工农业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十年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失误。四项基本原则早就提出来了，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不够，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爆发了北京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历史告诉我们，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含糊。李先念主席在贺信中讲到：要就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进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育，通过活生生的历史事实进行教育，让人民认识真理。这就给我们文史工作和这次会议指出了目标和方向。

文史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史工作的同志们是很辛苦的。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有的同志为征集到一份有价值的史料，克服重重困难；有的同志经常起早贪晚、加班加点；还有的同志带病坚持工作。大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表现了高尚的思想品德和革命精神。我当主任的时候，很多问题没给大家解决好。对于文史工作，我是一名新兵，是一个外行，在和同志们的相处中，我向大家学到了不少知识，学到了很多好作风。今后，我还将一如既往地向着同志们学习，一如既往地期待着文史工作在李先念主席的关怀下，在孙晓村主任和各位副主任、各地政协负责同志的领导下，在文史办公室同志们的努力下，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最后，我再次向同志们问好，并通过你们向其他文史工作同志们问好，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在全国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1989年8月24日)

张友渔

同志们：

我们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1959年在周总理的倡导下开始的，到现在已经30年了。在这30年里，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了很大的发展。

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阶段，我们要布置新的工作。刚才，孙晓村同志已经详尽地、全面地讲了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再讲的了。我本来就没有准备讲话，但作为参加过文史资料工作的老主任，总要表表态，所以，我今天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一些技术性问题讲一点意见。都是些老经验，不一定适应新情况，讲一讲，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问题。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分几个步骤，第一是征集资料，征集来资料以后，再对资料加以核实、分析、处理，提供研究历史之用。在这些步骤中，最主要的是征集。征集工作一定要认真做好，如果征集工作没有做好，所得到的资料不可靠，那么，以后的工作也就没有可能做好。所以，征集资料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

资料征集来以后，要加以核实。因为征集来的资料不一定完全可靠，需要分析、研究，然后再处理。判断它是不是可用，是只能用来作历史资料呢，还是同时也可以发表呢？只有分析、研究后才能考虑这些问题。我以为最主要的是供

将来研究历史的人用，用历史的事实来教育后代。当然，对现在的工作，如经济文化建设、改革开放有帮助的，也可以发表。但是，发表不是主要的征集才是主要的。征集到的资料，我们认为可以发表的要发表，但不是为了发表而去征集资料。凡是不适于现在发表的资料就不要？不是。我们是为了研究历史，用历史事实来教育人民，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就应该征集。我们是征集资料，不是征求文章。这一点恐怕首先要弄清楚。因此，征集的面要稍微宽一些，认为有历史价值的，需要后人知道的，就应该征集，不管它成不成一个系统。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问题，只要它对后人研究历史有必要，能使后人了解过去真实的情况，用来教育人民，这样的资料就可以征集。哪怕只有30字、50字，3句话、5句话，只要它有价值，对研究历史有用，就应该要。不能因为它不符合发表标准就不要。当然，对于现在可以借鉴的、可起教育作用的东西，应该发表。但发表的东西必须精选，可以发表的，又是必须发表的才发表。发表的时候要很认真，不能以讹传讹，以假乱真，要真正把内容研究清楚。另外，有些虽然是真实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可以发表。研究历史需要的，当前也可能不需要。有些东西，当发表也可能影响到别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发表是要慎重的，宁缺勿滥。这是我对文史资料工作的老经验，就是资料要尽量征集，不要遗漏，但发表要精，要少，可以发表的才发表。我们现在出文史刊物，这是必要的。但不要求多，有可以发表、又必须发表的，多就多一些，没有，就少一些。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征集的资料一定要真实。周总理也指示我们要“存真”，“实事求是”。所以，我们一定要

搞真实的东西，不能有虚假，不能像文艺作品那样有所渲染。文史资料要是一就说一，是二就说二；好的就是好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要如实记载。至于是不是要发表，那是另一个问题，刚才已经讲过了。将来，当然是要发表一些作为历史资料，也不是全部发表，同样是要认为有用的、可以发表的才发表。不但发表的资料要真实，真实的也不一定全能发表。所以我说首先要真实，不能虚假，不能像写文学作品一样可以渲染以至虚构。

还有一点，不能够根据当前的要求改变过去的事实。过去本来不是那么个情况，现在需要那么讲，就把过去的事实也说成是那样，这样不但违反了历史，破坏了历史，而且对后人了解历史，取得经验教训也没有好处。现在有些回忆录就不是完全真实的。造成不真实的原因，有些是客观问题，如过去多少年的事情，现在记不清了，这是可以原谅的。有一种情况就不好，是为了表扬自己，或为了洗刷自己本身的缺点；另一方面也许是为了要诋毁别人、贬低别人。这样写出的回忆录，不是真实的。写回忆录，自己有缺点，应当讲出来，别人的优点也要讲出来（当然别人的缺点也要讲出来），应该实事求是。但是，有的人的回忆录就不完全是这样。过去自己或涉及的别人不是这样做的，现在却说成是这样做的。甚至把坏事说成好事，把坏人说成好人；反过来，也可能把好人说成坏人，把好事说成坏事。我这里不是说对那件事情评价的好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评价一件事情的对或不对，可以有你的看法。我是说不能改变那件事情的本身。例如，那个人本来做了一件好事，你不讲，你却另外捏造了一件假的事情，说是他做的。这是不可以的。不是说对

事件的评价如何，而是说不能改变、曲解事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迎合现在的潮流，改变过去的事实。现在要求大家怎么做，就把我过去做的事情也写成是现在要做的事情一样，那就不行。例如，现在我们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人过去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他对过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检查、不反思、不改正，而是改变了事实，说我过去是怎么怎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是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为适应今天的要求，把过去的历史改变了，说我过去就是这么做的。那样不行。所以，我们在征集文史资料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要光看他文章写得好就拿来发表，而要看他写的内容真实不真实。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内容不真实，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能要；如果真实，文章写得不好，甚至有的写得文字不通顺也要征集，作为资料。如果要发表，再加以整理嘛。那是第二步的手续。首先要求真实，然后才考虑它可以不可以发表。

第三个问题，就是怎样去求真实，怎样去征集资料。仅仅发几封信，让大家来投稿，是不够的。一定要有计划，考虑需要征集哪一类资料，需要找哪些人征集。像我刚才讲过的，不管事情大小，文字语言少，只要有历史价值，我们就可以去征集。一定要找知道那个事情的人，了解那个事情的人，最好是亲身经历了那个事情的人。当然，年纪大的要先找、早找，不然他就会死去了，把材料带到棺材里去了，找不到了。这是对资料的“抢救”工作。所以，不是要找那些写文章写得好的人，而是要找那些了解我们作为历史资料需要的那些事实的人，而且最好是先找那些年纪大的人。怎么去找呢？要派专人去找，就是我们搞文史资料工作的人去

找。找到以后，一定要让被征求的人做到真实，对了解的情况，一定要真实地讲出来。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就是要真实，假的不行。不要给人家出主意，说你应该怎么写，现在需要你怎么写，等等，不能这样。应请他在符合真实的条件下，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他就是当时骂了我们共产党也不要紧，我们并不是都要发表嘛！他那个时候是一个真正反共的人，后来改变得成为一个赞成共产党的人，这是好的。但如要征集那个时候他做的事的史料，就是他真实讲。举一个例子。李任潮先生30年代中叶以来，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同我党合作很好，对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解放后是我们国家的副主席，是民革的领袖。可是，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曾镇压过革命，杀过共产党，总不能说没有那件事情。我与任潮先生的关系是很好的，我做统战工作，他是一个重要的对象。他还掩护过我，帮助我从桂林飞往香港。盖棺论定应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对大革命时期广州的那个事情，我们是既往不究了。但不能说他那时就是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吧！就是任潮先生也并不隐讳他的错误，而是追悔。他要是写那一段的话，就会写当时是怎样做的，为什么那样做，像写以后同我党怎么合作、怎么帮助革命等等一样，都照实际情况写，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不能因为他有过去那一段事，就评价他始终反革命，也不能因为他后来做了好事，就说他过去没有那样一段事。这是一个具体例子。所以，我们征集史料，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为了适应今天的要求，让人家把过去的事另写一套。我们做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时，要把自己当作一台录音机、一个速记员，而不能以乐队指挥、戏剧导演自居。否则，你就得不到真实的东

西。你要指挥他怎么写东西，导演他怎么写东西，那怎么能得到真实的东西呢！你只当录音机、速记员，他要怎么说，就随他怎么说，你只要如实拿回来就是了。拿回来的东西，当然要进一步核实。他的东西究竟是否真实，那就是核实。要下一定功夫，要参考别人写的东西来核实，不能偏听偏信。要发表的东西，就更需要进行核实，不能随便发表。这就要有汉学家认真考据的态度。由于对一件事情常会有不同的说法，这就要研究、核对，考虑研究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假如一时弄不清哪一种说法是对的，那也可以各说并存，说明白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

我就讲这几个技术性问题。总之，我们是搞资料，不是搞文学作品、搞宣传作品。征集来的东西主要不是为了发表。出版有价值的资料有必要，但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而是我们附带的任务。专为发表而征求东西，是出版社、报刊的任务。我们征集资料是主要的，资料可以发表，或加工以后可以发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英 家 起 义

钟起昌整理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人民满怀希望和平、民主建国，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与人民背道而驰，疯狂地制造内战，妄图实行法西斯专制，人民又被推进战争烽火中。一九四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后，即将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都遭到失败，兵枯粮竭，蒋介石企图挽救其危亡，继续在全国各地大肆征兵、征粮、征税，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升，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加以连年遭受天旱，粮食歉收，人民真正处在天灾人祸之中，逃荒要饭，卖儿卖女，悲惨景状，罄竹难书。中共桂东地下党，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结合各地实际，领导人民积极开展各种斗争。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要求，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要求在蒋管区的广大农村，要趁蒋介石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征税，民不聊生的有利时机，地下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游击根据地。中共广西省工委于同年四月在横县召开有各地负责干部参加的重要会议（历史上称为‘横县会议’，）省工委书记钱兴同志在会上作了《一切为着准备武装起义而斗争》的政治报告。会议根据党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广西的形势，决定配合解放

大军正面战场的胜利，迅速组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是广西地下党工作的一个重大转折。

桂东地下党特派员吴赞之同志参加“横县会议”回到英家后，及时向张赞周、王家纪同志传达了会议精神，以及省工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工作部署。共同学习分析了形势：

（1）认清人民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军事形势发展很快；（2）广西连年干旱，粮荒严重，加上当局扩充兵力，人民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激烈；（3）桂东各地多年来有党领导，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如钟山英家，早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就建立了中共英家支部，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机关在一九四二年桂林发生“七·九”事变后，曾转移到此，并从各地调来一批同志协助开展工作，党的组织有一定发展，群众的觉悟有很大提高，其它方面也有较好的基础。富川古城则在一九四二年就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4）贺县、钟山、富川、昭平等县地处湘、粤、桂三省边界，属五岑余脉山区，山高林密，层峦叠障，进行游击活动大有回旋余地。大家经过分析讨论，认为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桂东地下党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以英家为重点，富川的古城作配合，共同行动，计划在年内发动武装起义。

同年四月，香港分局调钱兴同志到西江游击纵队任副政委，上级根据钱兴同志汇报广西当时没有军事干部，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抽调曾在新四军任职的军事干部姚大年、孙亿冬两同志支援广西，为钟山英家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负责人。

五月下旬，姚大年、孙忆冬两同志，奉分局之命，从香港取道昭平，和在昭平走马教书的地下党的肖雷同志取得联系，之后，到达钟山英家，传达上级指示，要求桂东尽快组织武装起义。吴赞之联系实际分析认为：钟山、富川两县的党组织要抓紧发动武装斗争，拿下两个国民党县府据点，同时切断国民党平乐专署和省府联系的电话，破坏公路、桥梁，把八步（平乐专署所在地）孤立起来，进而吃掉前面这股敌人。起义以后，第二步工作计划是建立姑婆山游击根据地。正在策划起义紧急关头，富川地下党汇报，富川古城起义的行动计划失密。又接钟山情报，钟山国民党县府为了应付前方的军粮，打算近日要将英家粮仓的数仟担粮谷运走。根据上级指示和形势变化，桂东地下党领导经分析研究，决定武装起义提前举行。

为了坚决完成省工委交给的重大任务，英家特支讨论制订了武装起义方案：

（1）决定成立革命武装游击队，武装起义总指挥由吴赞之同志负责，军事指挥由孙忆冬、姚大年两同志负责。后勤工作由张赞周同志负责。

（2）以革命的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县、乡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府；夺取国民党政府和地主阶级储存的粮食，发给缺粮的群众度过春荒；

（3）决定起义时间。会议对起义的时间选择，经过精密的分析后，决定于六月四日晚九时三十分集中，参加起义人员在英家附近白岩塘泉公庙集中誓师。晚十时正举行起义。集中的时间和地点由党员骨干分头秘密通知；

（4）起义行动计划和进攻目标：六月四日晚十时，首

先解决国民党英家乡公所内反动武装和打开英家粮仓，开仓济贫。接着带领队伍赶到公安、大桥，攻下两个乡公所；随后攻打国民党钟山县政府，捉拿国民党县长和自卫队大队长；天亮前后，部队到达姑婆山。五日或六日攻打八步国民党平乐专员公署；

（5）战术上，英家特支根据王家纪同志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便派他预先到英家乡公所内‘作为起义内应；公安、大桥两个乡公所只破坏其政权办事机构和收缴其武器。内应同志待起义队伍到达时，放信号进行内外联络。

（6）参加起义人员，选择英家上街、下街、大同村、油榨村等地的党员和基本群众中的骨干份子。

六月三日晚上，在英家白沙井张赞周屋后的密林土坡上，召开了起义骨干分子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吴赞之、肖雷（特邀）、孙忆冬、姚大年、张赞周、王家纪、朱维新、曾驹光、罗玉坚、杨国民、陆智理、谢刀天等同志。杨国民担任警戒。桂东特派员、武装起义总指挥吴赞之同志主持会议。会上，宣布起义方案，公布各片负责人名单，提出分片通知的办法。英家上街片由王家纪负责；大塘背片由朱维新负责；新兴寨片由曾驹光负责；龙福片由罗玉坚负责；油榨片由张赞周负责；横山、黎家洞、矮山、上下岩等村由何仕郁负责。起义的骨干队伍选择了五十多人枪，分为三个中队，罗玉坚领导一个中队，何铎贤领导一个中队，曾昭著领导一个中队。

确定参加起义的本地党员有：张赞周、王家纪、朱维新、曾驹光、何仕郁、何仕南、罗玉坚、陈作民。外地党员吴赞之、陆智理、谢刀天、孙忆冬、姚大年。继续隐蔽的党

员有：陈炳谋、邱汉民、罗杰、邓瑶章、陈本章等，还有与英家支部有直接联系的杨国民（陆川人）他们虽然不参加公开行动，但都秘密参加这次起义工作。

会议还要求以单线秘密联系的方法进行，交代清楚三件事：

（1）要绝对保守秘密，对任何人不得透露，对自己的父母妻子都不准讲；（2）一定要保证行动迅速准确，按时到达规定的地点集中，先以片集中，然后由片负责人带到白岩塘泉公庙附近的江岸和白岩洞内等待，以“火光”为号，再把队伍带到泉公庙集中；（3）凡武装队员必须用白毛巾绑在左臂上，以示区别。

为了做好外应工作，使起义后能有较开阔的活动余地，吴赞之同志征得肖雷同志的同意，组织相应的武装斗争，以配合英家的行动。被邀请前来参加六月三日晚的紧急会议的肖雷同志，在会议结束后即离开英家，回到桂北的平乐、恭城等地，组织外围侧应工作。

六月四日晚饭后，吴赞之、张赞周、孙忆冬、姚大年、杨国民等五人先到油榨村找来一只大公鸡和一缸米酒，放到泉公庙里。各片起义的武装队伍，左臂系上白毛巾，按布置由各片负责人带到白岩塘泉公庙附近等候。九时三十分，吴赞之同志点燃熊熊火炬向四方一摇，各片武装队员在片负责人带领下，很快集中到泉公庙，泉公庙的神台设在正中，吴赞之同志严肃地站在桌上向大家说：“同志们：今天我们集中在这里，要进行翻天覆地的革命起义。我们要翻身，要过我们应该过的好日子，就要推翻那个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反动政权和剥削制度，我们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完成这个艰巨